

# 星斗其文 赤子其人

## ——文学馆收藏的沈从文手稿 □刘屏

在沈从文那高2.8米的五彩石墓碑背面,刻有张充和撰联并书的16个字:“不折不从,星斗其文;亦慈亦让,赤子其人”。这是沈从文人生和创作最精辟的写照。巴金说:沈从文是他最佩服的三个最有才气的作家中的一个。文学馆收藏的作家手稿不少,且不乏大家名家的,惟沈从文的手稿不多。据我所知只有两部。

一部叫《跑龙套》,是一篇3400字的散文,用毛笔竖行书写,字迹工整娟秀,曾在1957年《人民文学》7月号上发表过。沈从文在这篇文章中说:“为避免滥竽充数的嫌疑,我常自称是个‘跑龙套’脚色。我喜欢这个名分,除略带自嘲,还感到它庄严的一面。……一个跑龙套的角色,他的待遇远不如专家,他干的工作却可能比专家还扎实些、沉重些。”这些文字体现出沈从文坦率直率的品质,也可以看出他当时的心境和心态。

另外一部是关于鼻烟壶的,没有篇名,是我国鼻烟壶内画的工艺美术大师王习三2002年春天捐赠给文学馆的,这其中还有一段故事。

王习三原名王端成,1938年5月出生在衡水阜城县,1957年考入北京工艺美术研究所,分配到内画组,在京派内画艺人叶祺和叶晓峰门下当学徒。王习三熟练掌握了“叶派”内画技法,初步形成了厚朴古雅、浑厚大气的京派内画艺术风格。出徒后调北京工艺美术厂搞内画创作。正当崭露头角之时,“文革”来临,他被遣返原籍。在衡水阜城老家的岁月里,他没有放弃喜爱的内画艺术,逐渐形成了浑厚高雅、轻盈飘逸的冀派内画艺术风格。1979年8月,王习三作为冀派内画艺术的创始人,在北京参加“中国工艺美术创作及设计人员代表大会”,和沈从文分在一个小组。小组讨论时,沈从文发言提到了故宫的精美工艺品和早年藏品失窃的事(包括鼻烟壶),引起了坐在旁边的王习三的兴趣和好奇,他很想了解更多宫内有关鼻烟壶的情况,沈老讲完,王习三想向他请教,又怕打扰别人,就拿出随身携带的便笺写道:“沈老:请您把上次讲的关于‘盗鼻烟壶’,之事的大约时间、地点等情況简写一下。”之后递了过去,于是,沈从文便用流畅潇洒的文笔做了详尽的解答。这份珍贵的手迹一共6页,王习三珍藏了20多年,2001年两会期间,王习三和部分政协委员前往参观了新建成不久的中国现代文

读沈从文的作品,就让人想起湘西那片热土,想起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在她们之中,既有纯情稚嫩的少女,又有饱经磨难处于社会底层的妓女,但在她们身上,通体闪耀着善良淳朴的人性。其中,少女形象尤其表现得鲜活透彻。

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以少女为描述对象的作品有《雨后》《阿黑小史》《媚金·豹子·与那羊》《萧萧》《三三》《边城》《长河》等,尤以《边城》最为著名。温顺乖巧、多情执著的边城少女翠翠,集中了湘西自然、民族、人情中最为优美的成分。翠翠甫一出场,作品中就有一段精彩的描写:“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的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和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之后递了过去,于是,沈从文便用流畅潇洒的文笔做了详尽的解答。这份珍贵的手迹一共6页,王习三珍藏了20多年,2001年两会期间,王习三和部分政协委员前往参观了新建成不久的中国现代文

学馆新馆,感触很深,他觉得由文学馆来保存这份珍贵文稿更为妥善,也更有意义。于是,2002年3月王习三亲手把它捐献出来。

沈从文这篇文稿写在“河北省衡水地区特种工艺厂便笺”上,内容很是精彩,这里不妨摘录一段:

我注意的,只是鼻烟壶(所谓料壶)仿翠玉的成就,因为涉及玻璃发展史的问题,以平板玻璃而言,到乾隆时还不曾普及,主要似乎是加工过程必需吹大再加热研平,再镀水银。但较大的金鱼缸,则已能生产,不仅《红楼梦》上提到,我还有机会见过。当时不过四元钱即可得到。式如下(沈从文在此画一小鱼缸图——笔者注)约一尺径近磨料,因为不是一般平玻璃,是加工磨成小冰片而成。至于玻璃珠子则三五年后已出现。战国已大量生产。东晋才发现吹成瓶类,隋才正式生产瓶子类(李静训墓出土),但唐代正式设官(在宫廷署下设治局),专烧五色玻璃珠装饰佛像。到宋还是大量出口品之一。但已有琉璃灯,照东京梦华录,梦梁录等均提及。技术上似仍不普及,所以明代宫中才大量制造“明角玻璃灯”。不太透明,但较结实。宋元重点都用在作假玉假宝石,清代则普及大量用到官服顶带上。鼻烟壶较早可能造办处烧造,作为赏赐用,记载相当多。但逐渐转为皇帝贵戚手头欣赏品,争奇斗胜,如汉人对于带钩的说法“宾客满室视钩各异”,因此各个料壶的品种,千奇百异,造办处以外,苏杨广都有新产品出现。但在加料上却彼此保密,在品种上为进展,在技术上则因保密而失传。

只上面一段文字已可以看出沈从文作为一个文学大家、一个历史研究专家的广博知识和深厚功底,融会贯通深入浅出的比较研究,仿佛探囊取物信手拈来,绝非一般的文学家或文物专家所能比及的。

在这篇文章里,沈从文提出了许多历朝历代可以引为内画题材的图谱、名画资料线索,如“赤壁图”、“兰亭雅集图”、“唐人会乐图”、“唐宋明人打马球图”,以及几十种儿童画类,还有黄庭换鹅、陶靖节种菊、周敦颐爱莲图、周处斩蛟图、西园雅集图等等供王习三参考。如借鉴用到内画鼻烟壶上都会有新意效果。沈从文还告诉王习三:自己曾过手上干种鼻烟壶,许多是在东安市场买的“处理

品”,很便宜。有朋友带到英国,有些还上了英国的鼻烟壶杂志。

作家汪曾祺曾在一篇名为《沈从文转业之谜》的文章中说,沈从文之所以能在文物研究领域取得巨大成绩,是因为他“能把抒情气质和科学条理完美地结合起来”。沈从文对文物产生兴趣要早于对文学的兴趣,年轻时在一个统领身边作书记时就接触了大量的古瓷字画碑帖铜器等,这颗“棋子”对他后半生转而研究古代文化文物有着不可忽略的作用。当形势迫使他不得不重新选择人生之路时,他选择了文物研究。离开文学界后,沈从文一直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后来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告别了喧闹的文坛,潜心于古代历史文化的海洋,让他在中国古代文物研究方面取得了斐然成果。留下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等学术专著。

进入文物界后,沈从文曾几次有机会重返文坛。1953年他作为美术组代表参加第二次文代会,毛泽东在询问了他的工作身体后说:你还可以写点小说嘛。沈从文只以微笑作答。1958年,他参加了一次宴请文艺界人士的宴会,时任中宣部副部长的周扬,也曾想请沈从文出山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被他婉拒了。上世纪60年代初,重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他曾想以张兆和堂兄张鼎和的事迹为创作原型,用长篇小说的形式表现一个共产党员在二三十年代的人生传奇,他已经开始深入生活,构思故事,终因难以割舍文物研究和无法面对当时的客观环境而放弃了。远离文坛种种,潜心文物世界,这一选择让他的内心既痛苦又轻松。

汪曾祺曾说:沈从文对文物的兴趣,自始至终是出于对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深爱。他的文学创作、文物研究,都浸透了爱国主义的感情。一颗炽热真诚专一的心,是沈从文在几个领域都能取得斐然成就的最大要素吧。沈从文还是个古道热肠的人,他愿意用自己的辛勤劳动为他人铺路架桥,“为各方面打打杂”。从王习三捐赠的沈从文稿上,同样验证了这一点。

最后还想顺便提一句,文学馆还收藏有沈从文的十几封信,都是写给作家的,其中写给巴金9封,给巴金夫人萧珊1封,给丁玲2封,给沙汀1封,给师陀1封,给林渭1封。虽然数量不多,但这些信都是收信作家本人或亲属捐给文学馆的,写信的时间基本是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和打倒“四人帮”前后两个时期,这也正是沈从文人生历程中“逆行”和“归队”的重要年代,从这些信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作家当年离开文坛的因由和30年后重返文坛的心境,是研究沈从文现象的不可多得的重要资料。

北京,一座承载着太多历史文化的古城,无数名人都在这里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上世纪20年代,沈从文离开湘西老家,只身来到北京求学,足迹所到之处都留下他坚定的文学信仰。正是这份执著打动了北京城。

### 酉西会馆

1922年夏,沈从文初到北京,一心想去大学读书。他的大姐沈岳鑫和姐夫田真一虽没给予物质资助,但送给他一句很受用的话“既为信仰而活,就要坚守信仰,因为除此外你一无所有”。正是这句话支撑着他度过人生最艰难的日子。

位于前门外杨梅竹斜街61号酉西会馆(会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遗产,旅居他乡的同籍人自发捐资修建,一种给养与交流的纽带),管事的是沈从文一位远房表哥,他得以搬进会馆居住。

只有高小文化的沈从文,未能通过大学入学考试,只好放弃愿望,开始自学。每日两三个馒头,一点泡咸菜便是佳肴,走出会馆,直奔宣武京师图书馆,两点一线。入冬,气温骤降,他仍薄薄单衣裹寒读……《笔记大观》《小说大观》《玉梨魂》,还有《史记》等相隔左右。那时,他也尝试写点小稿,本想换取三五元稿费,奈何挣钱不得,却招挤兑。每次去报社,门房都要索取一两毛钱小费,也许因为他太寒酸吧。那些日月,沈从文是一个不被北京接受的“乡下人”。

### 银闸胡同公寓

因会馆只提供乡友暂时居住,沈从文不得不另做打算。在农大读书的表弟帮助他搬进了银闸胡同,这所公寓毗邻北京大学红楼。红楼附近公寓众多,栖居着各地学子。时任北大校长的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北大校门向所有人开放,沈从文顺理成章的是成为不注册的旁听生。国文、日语、历史、哲学课等,这份权利与自由令沈从文欣喜若狂。然而他仍然想成为一名正式学生,取得大学毕业证书。1923年秋天,他曾参加燕京大学二年制国文班的入学考试。但终因一问三不知而落榜。至此,沈从文对正式入学死了心,他开始没日没夜的写作。

然而,他投出的稿子,篇篇石沉大海,杳无音讯。但沈从文并没有气馁。因为他心中有坚定的信念:社会改造必须从文学革命开始。可是美好的梦想也难奈身上仅剩的几块钱,仅有的两条棉被。一天,饥饿难忍的沈从文差点就在天桥上参军入伍,只因按下一个手印便可领到饭费。幸有姐夫那句忠告,饥饿最终没打败信仰。

1924年冬,沈从文怀着一丝希望,向几位知名作家写信求助。这一次终于没有落空,他得到了郁达夫的帮助与鼓励。此后,他不懈的努力,几个月后以休芸芸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散文《遥夜》。这篇文章被北大教授林宰平看到,他被这个年轻人坚定的信念打动,遂介绍一份工作——香山慈幼院图书馆办事员,月薪20元。

### 香山慈幼院

迎接在北京第一份工作,沈从文来到香山。最留恋处莫过于香山“听法松”旁的山石,他与好友董景天、陈鹤琴常在此谈文学、谈人生、谈神仙鬼怪,偶来雅兴,还会从屋里抱出一面琵琶,用刚学的蹩脚手法,弹奏一曲。也是在这里,他结识了胡也频、丁玲,却因际会在20世纪30年代初遭遇与两位挚友的死别、生离,成为一曲文坛悲歌。

1924年12月,沈从文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一封未曾付邮的信》。1925年至1927年,他的作品频频见诸于《晨报副刊》和《现代评论》,1926年他的小说开始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福生》《更夫阿韩》《堂兄》《黎明》《哨兵》《十四夜》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大致170余种。

快乐的时光总是短暂的。沈从文因发表了两篇讽刺慈幼院的小说《第二个狒狒》和《棉鞋》,得罪了慈幼院的教务长,最终他只得下山。离开香山后,沈从文先后担任了《现代评论》的发行员和冯玉祥秘书处的办事员。香山是沈从文迎来第一线生机的地方,同时也是令他备受屈辱的地方,以致很多年后他都不愿再踏进香山一步。

### 西城达子营

1932年夏,杨振声、沈从文辞去青岛大学职务,回到北平主持《大公报》文艺副刊。次年9月,他与张兆和在北平中央公园宣布结婚,婚礼很简单。婚后两人住在西城达子营的一个小院里,也就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最辉煌的创作。

在此其间,沈从文创作了小说《虎雏》《猎人故事》《扇陀》《如蕤》《月下小景》《阿黑小史》《八骏图》《新与旧》《主妇》等,中长篇小说《丽思中国游记》《边城》,散文《从文自传》《记丁玲》《湘行散记》等,文论《废邮存底》《烛虚》等。他一生的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

这时,他因小说成就而闻名,结识了许多文友,有凌叔华、林徽因、卞之琳、冯至、废名、何其芳、芦焚等,他们常举办小型聚会,有时在达子营,有时在林徽因“太太的客厅”,大家因文学观念相近,渐渐形成京派作家群。《大公报》文艺副刊成为京派文学的创作重镇,沈从文渐渐成为核心。京派文人虽住在北京,但其创作大多并不解说北京,而是表现中国的乡土、偏僻、原生态的边地生活样式。其中《边城》最具代表性,抒写古朴自然的湘西。小说中蓬勃的自然生命状态与都市生活的虚矫相对立,勾勒了一个纯美的边地世界。此时此刻,北京城已正式接纳了这个“乡下人”。

### 东堂子胡同51号

新中国成立后,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主要从事文物、古代服饰的研究。此时,他住在东堂子胡同51号院,原本有三间房子,但“文革”时被人占去两间。

1971年冬,沈从文因病特准从干校返京后,就蛰居在这一间小屋里。年近古稀的他,在简陋的房子里,从商州到清明,上下三千年的中国各朝各代文物图样,大小不等的说明纸条、卡片悬挂在墙壁和窗栏上,与地上摆满的各种图册交相辉映,不管不顾地写着《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巨著。这一书包括数百幅实物图像,近20万说明文字,先后增补修订数次,经历了整整16个春秋,它的问世成为学术界一座文献瑰宝。此外,沈从文对文物也颇有研究,还撰写出版了《中国丝绸图案》《唐宋铜镜》《龙凤艺术》《战国漆器》等著作。

### 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

沈从文先命最后的日子,是在崇文门东大街22号楼的寓所中度过的,这是他一生住过的最舒适最敞亮的房。他的表侄黄永玉在《这些忧郁的碎屑》里记下了沈从文最后的生命路程:“表叔在临终前两三年,得到党和政府的认真关注。给了他一套宽大的房子,并且配备了一部汽车和一位司机。遗憾的是太晚了。”

从西西会馆、银闸胡同到崇文门东大街,匆忙6载春秋,见证着北京城的历史沉浮,也见证着外乡人在北京的心路。从《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到北平《大公报》《经世报》《益世报》和《平明日报》四大副刊编辑,沈从文除培养集结了一批受新文化感召的青年人外,自己一生创作结集约80余部,是现代作家中成书最多的一位。他的文字与信仰,与这座城以独特的形式交汇,现代性与淳朴乡情精心交织出一个令人向往的湘西世界。

最后,又想起黄永玉的那句话:“一个战士不是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

## 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

□胡嘉

而又真诚的品性。最为典型的特征是苗族少女以对歌表白爱情的形式,这种在土家族、苗族青年男女中广泛流行的传情方式,淳朴自然,将一切美妙的话语都寄托在歌声里。作品《萧萧》中,萧萧的真正爱情诞生在花狗的歌声中。《月下小景》中的姑娘情愿与小寨主傩佑在歌声中幸福地死去,也不愿受土司王的野蛮而生活。《媚金·豹子·与那羊》《神巫之爱》等作品中都写到青年男女的真情如何在歌声中凝结成纯洁的爱情。《长河》和《三三》中,夭夭和三三在朦胧的爱情中表露出对新生活的憧憬,而这种向往似乎与凡世的物欲无关。沈从文通过笔下人物对自己生命的自由支配寄托了他对自然人性的礼赞。

这样的礼赞也给我们带来更多关于文化意义上的思考。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思想就在沈从文笔下的少女形象身上得到充分体现,融化在湘西那片原生态般的苗族风俗与乡村生活交融的河流中,是湘西的温柔之水给了沈从文灵感,他便将这水的神性重新嫁接给生活在这些土地上的少女们,她们长得水灵,却从不缺乏内心的坚韧。《边城》里的最后“翠翠辫子上扎了白绒

……忙把身子背过去拉船”,继续等待“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的二老,倔强的少女三三“好像不曾听到这个话,站起身来又跑出去了”。沈从文将烂漫多情、耽于幻想、本性率真的自然秉性全部赋予在了湘西少女身上,她们身上充盈着隐忍、悲哀、茫然,或喜或悲、或爱或憎,在封闭的湘西世界里,她们悄无声息地生,默默无闻地死,对生活似乎毫无还手之力,只能在朦胧的想象和默默的反抗与承受之中。沈从文对少女追求自由的人性表示出了深切的悲悯。沈从文的作品富有如此的生命力,其中独特的自然美和奇特风情来源于湘西一带楚巫文化余风。楚文化包含着巫风的独特精神文化风貌,从楚辞中就能看出楚国人天真浪漫、崇尚热情自由的个性。沈从文的笔下,举凡经典的形象必是源于洒脱自由的灵魂,其不羁的行为中伴随着的是真诚热烈的情感。他对湘西少女的爱恋采取的直观面对的态度,以肯定人的本性、肯定追求自然淳朴的爱为前提。少女的爱情在这里被诗化,这爱中带着坚韧执著,伴随着神性与魔性的内容,成为一种生命元气旺盛和人性健全的象征。

## 沈从文的诗歌创作

□北塔

沈之所以大用特用民间文化资源,一方面固然是因为他的家乡条件所造成,另一方面还有一个重要契机,那就是他到北京来学习时正好赶上北京学术界方兴未艾的歌谣搜集运动。而早在1918年春,北大就成立了歌谣征集处,发布了一则详细的声明,动员全校的教授、职员和学生参与搜集活动。北大的这一活动固然影响到了他的小说创作,对他初期诗歌创作的影响更直接、更致命。歌谣运动中积极、最成功的实践者是刘半农和顾颉刚。1919年8月,刘半农在由其家乡江阴北上的途中,向船夫采得20首吴语歌,回北京后,马上编为《江阴船歌》。刘还模仿这些民谣,创作了一批民谣体诗歌。沈正是借鉴刘半农他们的做法,一边搜集民谣,一边开始他的诗歌创作。他搜集的是家乡“镇竿”(今湖南凤凰县)的歌谣,他称之为“镇竿”土话,并解释说,那是“苗民杂处几同化之外之湘边镇竿地方土话也”。沈共搜集了两组“竿人谣曲”,前一组是“单歌”,共42首,分两期发表于1926年12月27日和29日的《晨报副刊》。后一组是“对唱”,共8首,发表于1927年8月的《晨报副刊》。对应于前者,沈创作了《乡间的夏》《镇竿的歌》《初恋》和《还原——拟楚辞之一》;对应于后者,他创作了《春》。

沈早年创作的民歌是自身条件局限和受到谣曲风潮影响的产物,是他自己的一种新尝试(他说是整个诗坛的新尝试,则掩盖了刘半农等人更早的努力)。从文本上来说,在1920年代的语境里,那些拟民歌可以看做诗歌的试验品,而不是诗,更不能说是成功的诗。因为,民谣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方言,二是乐曲。方言离不开当地的生活环境,乐曲则必须让人唱出来。沈在北京用他的湖南老家的方言写作民谣,既离开了方言的环

境,又缺乏乐曲的支撑,当然要失败。至于“拟楚辞”云云,恐怕是源于沈的另一层误解。“楚辞”是屈原运用楚地(今两湖一带)的文学样式、方言音韵创造的一种诗体,已经高度文化化了,已经远远不是民谣。沈的“拟楚辞”与民谣也隔了两层。

问题是,沈还死死地想要留住那种话语方式、那种调子,最终显现出来的必然是两头没有着落的状态。尽管他刚刚写完时,曾兴致勃勃地自诩说,那些拟民歌“新鲜、俏皮、真实”;这三个特征表面上是实现了,但并不能保证作品的丰富内涵。况且,用白话或文言也能写出这三个特征。也许是沈自己也觉得这种模仿民谣腔的写作没有前途,甚至无趣,很快便放弃了。

但他写的诗冲却无法抑制。他开始向周遭学习。当时,占领北京诗坛的是新月派。而沈与新月诸人的关系相当密切,这层关系使他的诗歌创作走上了正轨,迎来了第一个高潮,具体时间大概是在1925—1928年